

文体功能:刘勰辨体的重要一面

赵俊玲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刘勰重视辨体,着眼于文体功能的辨体是《文心雕龙》辨体批评的重要角度。主要体现在对于功能相近的文体,刘勰既看到了它们的交叉互渗,又往往刻意规范它们的功用,以对之进行相对明晰的区分;还体现在他关注承担原生文体部分功能的新文体,辨析描述其衍生、发展过程。这样的辨体方式,一方面使人们能够迅速地认识各种文体发展的主要线索,及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能反映一些内涵、外延宽泛,或功能复杂的文体不断衍生分化的事实。但同时,也应看到,刘勰有时不免对某些文体描述不够客观、全面,又不免分体过细。

关键词:刘勰;辨体;文体功能;文体互渗;分化

作者简介:赵俊玲(1981—),女,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ZW062)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7)06-0132-06 **收稿日期:**2016-10-22

刘勰注重辨体,辨体批评是《文心雕龙》文体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刘勰辨体,不仅在《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中,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1924}的方法,将三十余种文体从命名、发展渊流,到代表作家作品,至体制规范进行了一一细致梳理,还多将性质相近的两种文体放在一篇中进行论述,既指出其同,又细辨其异。其辨析从文体的风格、体式、功能、题材等各个方面展开,组成了内容丰富全面的严密体系。刘勰的辨体理论,继承前人,显然又远远超越了前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自汉魏以来,文体辨析到刘勰这里才真正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更具有指导意义。”^{[2]92}

目前,在学界对《文心雕龙》文体论日益重视的情况下,刘勰的辨体批评也日渐受到人们关注。学者多研究刘勰的辨体方法、辨体理论体系,及其从风格、体式、题材等方面对文体的辨析^①。但作为刘勰

辨体重要角度的文体功能,却很少被注意。究其原因,刘勰从风格、体式、题材等角度的辨体,不仅集中在自《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文体论中,更在《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附会》《总术》《知音》《序志》等篇目中有颇多表现,这些篇目一向最受研究者重视。而从文体功能角度的辨体,一般只能伴随具体文体的考察而进行,即基本只见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但刘勰颇重对诸种文体,尤其是实用文体的文体功能进行考察,这是他辨体的重要角度。忽略这一角度,就不能全面认识刘勰的辨体观和文体论,刘勰文体论的某些重要理论价

① 如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6期),任克泽《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理论体系——兼论其辨体观的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学术论坛》2015年6期),张利群《刘勰“辨体”的文体论意蕴及批评学意义》(《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2期),邓新跃《〈文心雕龙〉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2期)等。

值也不能被深入发掘。

刘勰从文体功能角度的辨体,主要体现在他对功能相近的文体,既看到了它们的交叉互渗,又往往刻意规范它们的功用,以对之进行相对明晰的区分;还体现在他关注承担原生文体部分功能的新文体,辨析描述其衍生、发展过程。

一、刘勰对因功能相近而造成的文体交叉互渗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曹丕《典论·论文》分四科八体论述文体始,我国的文学批评著作论述文体,愈分愈细的同时,往往将性质、功能相近的文体相并论述。《典论·论文》将所论八体分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已然如此。西晋陆机创作《文赋》,将文体进一步细分为十种,其文体之排列,诗、赋相临,碑、诔相并,铭、箴对列,奏、说并排,反映的也是作者对文体性质与功能的认识。《文章缘起》是南北朝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一部文体论著作,任昉将时存文体分为八十四种,这种细致的划分颇为学界诟病,且既列表又列上表,既列离骚又列反骚,既列谢恩又列上章^①,颇受非议,但可窥见的是,任昉对文体细密的划分,很多时候依据的也正是文体功能。萧统《文选》共分三十九种文体,这三十九体的排列顺序,傅刚先生有言:“就散文部分看,《文选》显然是从朝廷文书开始,反映了上对下的关系,如诏、册、令、教;其后是下对上,如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再以后是反映一般关系的文体,如书、序、论、赞等;最后是与亡人有关的文体,如诔、哀、碑、吊、祭等。”^{[2]215}与文体的功能密切相关。《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产生于这样的文体批评背景下,也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而且,刘勰开始明确讨论功能相近的文体之间的关系。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其中《明诗》至《书记》二十篇详论了三十余种文体,除少量篇目如《明诗》《乐府》《诠赋》《史传》《诸子》等,是一篇论述一种文体外,其余都是一篇论述两种文体,而两种文体列为一篇的主要依据,就是它们文体功能的相近。如《颂赞》篇论颂、赞二体,颂“美盛德而述形容”^{[1]313},主于颂扬,而赞“本其为义,事生奖叹”^{[1]348},二体的主要功能是相近的,刘勰的看法是,赞“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1]348-349}。又如《铭箴》篇论铭、箴二体,刘勰认为“箴颂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1]420},这相近的功用也决定了它们体制上的一些

共同追求:“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1]420}再如《诔碑》篇论诔、碑二体,两体都是针对亡人的,“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助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1]457},具有共同的纪念亡者的功能特征。又如《檄移》篇论檄、移二体,刘勰虽指出檄多用于军事征讨,移多用于官场声讨劝谕,但实则“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1]789},因同为晓谕声讨之用,实早已互渗参伍。最典型的是《章表》篇,章、表虽属二体,在此篇开头,刘勰也试图从功能方面对二体进行区分:“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1]826}但在实际的创作中,谢恩的表有,陈请的章也可见,历代章表作者一直未严二体之界域,所以《章表》篇论此二体,终不得不并行而述:“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1]843}只能大体言二者都是用于向皇帝进言的文体而已。

针对诸多文体因功能相近,而造成交叉互渗的事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专门提出“参体”一词:“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论文,则与叙、引共纪。”^{[1]669}实际认为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等八体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用来说明道理的,在这一前提下,它们都与“论”参体,即与论在文体功能上表现出一致性,从而互相影响、互相配合、互相参照。当然,从文体表现形式来说,论体文与传、注自然有很大的不同,如周振甫先生就言:“像‘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序者次事,引者胤辞’,都不算论说,像注《尧典》、解《尚书》只是注解而不是辩论,不必归入论说。”^[3]认为传和注不同于论说文,也不应归为论体。这种说法自然是很有道理的。但王梦鸥先生有言:“今按其所谓与论文名异实同的八种文章,依他的意见是:有关政治的论文如‘议’、‘说’,有关经书的论文如‘传’、‘注’,有关史事的论文如‘赞’、‘评’,有关题旨的论文如‘序’、‘引’;而‘议’是

① 《文心雕龙·章表》言:“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文心雕龙》,第826页)谢恩是章的主要功能,后来章表混用,章的功用范围有所扩大。

提出适宜的见解,‘说’是提出使人悦服的意见;‘传’是转授先师宝贵的经验,‘注’是确定文字真正的涵义。至于‘赞’则以补充史文之未备,‘评’乃以裁量公正的事理。‘序’以条理叙事,‘引’以贯串题旨。名称虽有八种,但揆其功用,都正是论之所以为‘论’的要点。”^[4]周振甫之否定刘勰的参体之说与王梦鸥之肯定,显然角度并不相同。刘勰从文体功能角度着眼,将形式差别较大的文体联系起来,看出他们存在的互相关系和影响,学术视野非常开阔。

可见,文体功能的相近,导致了一些文体的交叉互渗,刘勰是承认这一现象的。但同时,他更重视辨体,试图通过刻意规范文体功能来辨析相近的文体。

二、通过刻意规范文体功能来辨体

当文体分类越来越细密之时,不同文体出现交叉和互渗成为必然的现象,文学批评家出于辨体的需要,就会如上述把功能相近的文体放在一起论述。然而,功能上的交叉和互渗已然成为事实,如何将文体明晰地区分开来,其实也成为批评家们的难题。刘勰为了清晰辨体,在论述功能相近的文体时,表现出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只重点论述和突出文体的主要功能,及由此功能而来的文体风格和体制特征,而不及其他。这是一种刻意规范文体功能的行为,目的在辨体。下以具体例子见之。

如《檄移》篇论“檄”,主要强调了它是用于军事征伐的一种文体。认为檄文的源头是誓文,即出征讨伐前训诫己方军队的文辞。被称为“檄之本源”^{[1]762}的是周穆王西征前祭公谋父的一番“威让之令”^{[1]762},这是见于记载的第一篇用于责让敌方军队的文辞。“选文以定篇”部分所论四篇文章,皆系讨伐敌方军队的公文。在刘勰看来,檄文既然是用于军事讨伐,则应有“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1]783}的风格特征。论“檄”体之末,刘勰仅以一言提到“檄”的另一种功用——征召:“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1]783}观《檄移》篇全文,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檄文的功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即此体主要用于军事讨伐,用于征召则已是其非常次要的功能。然而,实则“檄”体还有晓慰功能,此点历代学者多有论及。《文选》五臣之李周翰注《谕巴蜀檄》有言:“檄,皎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5]而《一切经音义》言:“檄书者,所以罪责当伐者也。又陈彼之恶,说此之德,晓慰百姓之书也。”^[6]则兼及了檄书之征伐、晓慰两种功用。晓慰类檄文确实存在,即如

《文选》就选了司马相如《谕巴蜀檄》这样的名篇。然刘勰何以弃而不论呢?刘勰刻意规范檄体的功用,把它相对单一地定位于军事征伐,无疑突出了它与“移”的区别。因晓谕百姓之檄,确与“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1]785}的移文界线模糊,颇难区分。

又如“箴”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称:“古有《夏》、《商》二箴,见于《尚书大传》解及《吕氏春秋》;然余句虽存,而全文已缺。独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备载于《左传》,于是扬雄仿而为之。其后作者相继,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韵语,而反复古今兴衰理乱之变,以垂警戒,使读者惕然有不自宁之心,乃称作者。”^{[7]140-141}按施用对象的不同,将箴分为官箴、私箴两种。在刘勰之前,被后人称为“私箴”的这一类箴文已经有不少创作,今天流传的有如扬雄《酒箴》、张紘《瑰材枕箴》、应贞《杖箴》、挚虞《新婚箴》、李充《学箴》、苏彦《语箴》等等。而且《铭箴》中还提到一篇——王朗《杂箴》,只不过刘勰对此私箴颇致否定之意:“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戒铭,而水火并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1]417-419}被刘勰认同的又是怎样的箴文呢?《铭箴》篇提到的是:《虞箴》,扬雄、崔骃、胡广《百官箴》,潘勖《符节箴》,温峤《侍臣箴》,王济《国子箴》,潘尼《乘舆箴》等。其中最受称扬的是产生于周代的《虞箴》,赞其“体义备矣”^{[1]409};其次则扬、崔、胡之《百官箴》,称“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1]414}。刘勰所认可的箴文,皆是沿“官箴王阙”^[8]传统而作的官箴,他认为如王朗《杂箴》之类私箴已走入歧途。相较于官箴,以人们日常修养等为箴诫对象的私箴,确实更易与另一种文体——座右铭相混,后者亦为箴诫个人而生。

再如《哀吊》篇论“哀辞”一体,称:“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1]464-465}“暨汉武封禅,而霍嬭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也。”^{[1]467}刘勰认为哀辞是用于童殇夭折及不幸暴亡者的一种文体。以这样的认识为背景,他指出最优秀的哀辞是西晋潘岳的《金鹿哀辞》《泽兰哀辞》,二篇皆为年幼夭亡者而作。然而,这只是哀辞发展的部分事实。实际上,此体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变化之一即施用对象的不断扩展。如三国吴张昭《陶谦哀辞》中的陶谦六十三岁而亡,寿终正寝而同样以哀辞致悼。潘岳《阳城刘氏妹哀辞》所哀悼的

妹妹已然适人,并非童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哀辞开始用于悼念亡妻,如《文选》所选《哀永逝文》就是潘岳为亡妻杨氏而作。孙楚《胡母夫人哀辞》悼念对象为嫁其不久即去世的夫人。在哀辞发展的最初阶段,仅用于童觴夭折与不幸暴亡者,使它与其他哀祭类文体如诔文、祭文等都有明确的区别。但哀辞的施用对象不断扩展,当扩至亡妻、寿终正寝者时,它与诔文、祭文等的界限便不那么明确了。

继如《哀吊》篇论吊文,“选文以定篇”部分述自西汉贾谊《吊屈原文》至西晋陆机《吊魏武帝文》十篇吊文,所吊对象是“或骄贵以殒身,或猖獗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行美而兼累”^{[1]478}者,与作者所处时代皆相距较远,生平行事又都颇能激起后人的感慨,作者实借凭吊古人来抒写自己的志趣怀抱,凭吊只是媒介,抒怀才是目的。这类吊文可称为吊古抒怀类吊文,与向同时人致吊的吊丧类吊文有很大不同,后者主要表达的是作者的哀悼之情。吊丧类吊文虽然后天发育不足,但也绝不是没有,即如《哀吊》篇所论及的时期内,汉代光武帝就有《临吊侯霸诏》,两晋陆机有《吊少明》,陆云有《吊陈永长书》《吊陈伯华书》,束皙有《吊萧孟恩文》《吊卫巨山文》等。很明显,吊文实可分为两类,且两类吊文创作旨趣及文体功用颇为不同。这一点,古代文论家也已指出,王之绩《铁立文起》有言:“王愨公曰:吊有二,并时而吊者不待言。有相去千百年而相吊,如柳宗元之于裴弘、贾谊之于屈原、陆机之于曹瞞是也。”^[9]然而,《哀吊》篇何以不论吊丧类吊文呢?《哀吊》论吊文止于西晋,这一时期内,吊古抒怀类吊文是吊文的主流。首先从创作数量上看,据严可均《全文》,汉魏今存吊文共十三篇,除光武帝《临吊侯霸诏》为吊同时人,阮籍《吊某公文》残缺,所吊对象不详外,其他十一篇皆为吊古抒怀之作;两晋今存吊文十二篇,其中吊古类八篇,吊丧类吊文四篇^①。其次从质量上来看,吊古抒怀类吊文的作者多名家,吊丧类吊文总体创作质量难以与之相埒。而且,相对于吊丧类吊文,吊古抒怀类吊文表现出突出的个性特征,那就是它把重点放在了作者的“自喻”上,而不是对死者的哀悼上。吊丧类吊文哀悼死者、安慰生者的功能,在诔、哀、祭文等体那里都能找到。

终如“祭文”,《祝盟》篇将祭祀告殓之辞分为两大类:“班固之《祀涿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1]376}

一为以祭奠山川为代表的禱鬼神之作,一为祭亲友之作。刘勰论“祭文”,即仅指向祭亲友文。祭亲友文为祭文的主流。即如现存最早的祭文——曹操《祀故太尉桥玄文》,就为祭亡友而作。至西晋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殷闾《祭王东亭文》等出,则这种文体已得到广泛应用,皆为祭奠悼念亲友而发。西晋而后,晋宋之际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祭程氏妹文》,南朝有颜延之《祖祭弟文》、王僧达《祭颜光禄文》、谢朓《为诸娣祭阮夫人文》、孔稚珪《祭外兄张长史文》、刘令娴《祭夫徐悱文》、沈景《祭梁吴郡袁府君文》等,可谓代有佳作。然而,祭文却并非仅有祭亲友一支。《文选》设有“祭文”一体,选文三篇,分别是谢惠连的《祭古冢文》、颜延之的《祭屈原文》、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都是刘宋时期作品,按内容可概分为两类:王文用以祭亲友,谢文和颜文用以祭古人。与祭亲友文不同,祭古人文的兴起应该要晚一些,今存多见东晋作品,如王珣《祭徐聘士文》、殷允《祭徐孺子文》、周祗《祭梁鸿文》、孙楚《祭介子推文》、庾亮《释奠祭孔子文》,至南朝,谢惠连有《为学生祭周居士文》,颜延之有《祭屈原文》《为张湘州祭虞帝文》,卞伯玉有《祭孙叔敖文》,萧绎有《释奠祭孔子文》《又祭颜子文》等。《祝盟》篇只论祭亲友文,祭古人文缺失,这应与《文心雕龙》一般不论西晋以后作家的惯例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祭古人文作为祭文的一支,与吊文一体的相混之势已成。如祭古人文的代表作品颜延之《祭屈原文》,为《文选》所录,而《文选》所列“吊文”一体,录有贾谊的《吊屈原文》。颜延之《祭屈原文》和贾谊《吊屈原文》皆作于作者被贬,途经汨罗之际,哀悼屈原都寄寓着作者对自身命运的叹息与思考,皆露出愤愤不平之气。因此,有学者言“吊文与祭文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10],具体到祭古人的祭文,更是难与吊文一体区分。

综而言之,刘勰往往强调文体的主要功用,以求更好地区分功能相近的文体。这样做,确实更大程度达到了辨体的目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心雕龙》辨体理论的缺陷也由之产生:一则,作为一部通论性著作,《文心雕龙》有对文体认识不够客观全面之嫌;再则,刘勰一方面承认文体交叉互渗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总是试图从主要功能出发辨别文体,

① 另此期还有陆机《吊少明》一篇,乃吊亡友之作,惜今只知篇名,内容亡佚。

似有自我矛盾之处。当然,所以这些都是由文体发展的丰富、复杂性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刘勰从文体功能角度入手辨析文体,对诸多文体的挖掘更深入系统,颇能抓住各种文体,尤其是实用文体的实质,取得了不小的辨体成就。因为,通过《文心雕龙》,我们确实对所论文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相近文体也能够更明晰地辨别。

三、辨析由文体功能的分化而衍生的新文体

新文体的不断产生,是文体愈分愈细的重要原因。促成新文体生成的因素有很多,如礼制、政治、社会生活等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的体式等。而由文体功能的分化而衍生,也是新文体产生的重要途径。刘勰论及多种由此类方式产生的新文体,他对这些新文体进行了辨析,描述其衍生、发展过程,并专门提出了“别体”的概念。

《议对》篇有云:“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父,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1]902} 称选拔官吏考试中用于回答皇帝问题的对策和射策是“议”的“别体”,它们产生很早,在汉武帝时已皆被应用,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直接针对皇帝的提问作答,后者则在多策中抽选一策作答。《议对》篇论“议”体云:“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1]882}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1]897} “议”体用于议论政事。对策和射策也用于议论政事,只不过皆被专门用于考试这一场合。这样看来,对策和射策其实是从“议”体衍生而出,用于专门场合的两种文体,使用范围非常具体,分担了“议”体的部分功能。则“别体”一词,指那些由功用较广的文体衍生而来、担任原生文体部分功能的文体。

像这样承担原生文体部分功能的衍生“别体”,在《文心雕龙》中还有一些,如“弹事”、“启”、“封事”、“便宜”、“奏记”、“笺”等等。

“弹事”一体,《奏启》篇言:“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1]863-868} “弹事”就是专用于弹劾的奏文,它从奏文分化而出,承担了弹劾这一专项功能。《奏启》篇论“奏”体云:“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1]852} 刘勰概括了奏文四方面的功用。

自汉魏六朝流传下来的奏文,确能与刘勰所言印证。有学者即据《文心雕龙》将汉魏六朝奏文按这四种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并得出结论:“两汉、三国、两晋、宋、齐、北魏、北齐七朝的奏文用于‘劾愆谬’者都居第二位,次于‘陈政事’。而梁、陈的‘劾愆谬’奏文数量则超过或等于‘陈政事’,居第一位。由此可见,‘劾愆谬’作为奏文四种功能之一特点突出。故刘勰《文心雕龙·奏启》总论奏文之后,又将‘按劾之奏’专门提取出来,予以重点介绍。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论》也曾指出,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陈事之奏’,一是‘按劾之奏’。正因为按劾功能之于奏文的重要性和突显性,使得其具备了独立成体的条件。”^[11] “弹事”作为“奏”的衍生文体,在西晋以后独立。

“启”亦产生于上奏类公文不断细化的过程中。《奏启》论“启”体云:“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1]873} 认为“启”从表、奏中分离而出,承担了表、奏的部分功能。就现存启文来看,一般所言事务都不关国体之大,也就是说,“启”的衍生,乃是出于言细小公务的需要。孙梅《四六丛话》论“启”言:“若乃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12] 因不关国体之大,其面目也就没有表体庄重严肃。相应地,如刘勰所言:“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1]873} 其篇幅也往往短小。将言细小公务这一职能从表、奏中剥离出来,代表着上奏类公文的进一步细化。启体较表、奏稍显随意,数语道尽,创作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自由一些。这一特性,是对一直以来面目庄重严肃的上奏类公文的稍稍解缚。但其文体功能还是相对欠明确的,故衍生、形成独特文体特征的时间就比较漫长。

显见,奏文不断衍生出新的类别。在汉前,奏文的主要行文对象是君主,随着封建国家的强大,等级制度的渐趋森严,一些针对封建皇帝以外人物的上奏公文产生,如“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1]936},上书三公之府用奏记,上书郡府用奏笺。又有一些上奏类公文则为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而衍生,如《奏启》篇还言及“封事”,上章封以皂囊以求机密;又言及“便宜”之体,乃为上“便于公,宜于民”^[13]之事。上奏类公文不断立体,细密繁生,如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所言:“文无类也,体增则类成。体无限也,

时久而限广。类可旁通，故转注而转新；体由孳乳，故迭传而迭远。”^[14]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有言：“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7]78}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各种文体参与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产生作品也越来越多，文体功能也会随之拓展；或一些文体在产生之初，文体功能就非常宽泛。这些促使承担原生文体部分功能的新文体不断衍生，继之也使文体辨析的难度加大。《文心雕龙》创“别体”一词，论述了因文体功能的分化而衍生的新文体，这是刘勰辨体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时需明了的是，这样的辨体方式，会从理论上引导文体愈分愈细的倾向。

综而言之，《文心雕龙》的辨体批评已经理论化、

参考文献：

- [1]刘勰.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傅刚.《昭明文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6.
- [4]王梦鸥.文心雕龙快读[M].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91.
- [5]萧统,李善.六臣注文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801.
- [6]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88.
- [7]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938.
- [9]王之绩.铁立文起[G]//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691—3692.
- [10]王人恩.古代祭文精华[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22.
- [11]黄燕平.南朝公牍文研究[D].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110.
- [12]孙梅.四六丛话[G]//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524.
- [1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808.
- [14]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7:4.

系统化，而利用文体功能来辨析文体，是刘勰辨体理论的重要角度和方面。他通过刻意规范文体功用，来辨析性质相近的文体；通过辨析由文体功能的分化而衍生的新文体，来描述文体的发生、发展。这样的辨体方式，一方面使人们能够迅速地认识各种文体发展的主要线索，及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能反映一些内涵、外延宽泛，或功能复杂的文体不断衍生分化的事实。但同时，也应看到，刘勰不免对某些文体描述不够客观、全面，又不免分体过细。依据文体功能来辨体，和依据风格、体式、题材等来辨体，在刘勰的辨体理论体系中同等重要，应予以足够重视，才能全面认识他的辨体观。但也应注意对刘勰从文体功能角度进行的辨体，辩证地看待，客观地评价。

Stylistic Function: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Liuxie's Distinguish Criticism to Style

Zhao Junl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Liuxi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distinguish criticism to style. Stylistic function was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his theory. The important expression was that Liuxie was aware of stylistic interpenetration to similar styles.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normed their stylistic function sedulously to distinguish these similar styles. On the other hand, Liuxie payed attention to those new styles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other styles and beared partial function from them. Liuxie's distinguish criticism to style is important, which make us comprehend those styles' s major areas quickly. On the other hand, he told us the fact that some complex styles differed constantly. But Liuxie's cognization to some styles wasn't comprehensive.

Key words: Liuxie; Distinguish Criticism to Style; Stylistic Function; Stylistic Interpenetration; Differentiation

[责任编辑 海林]